

当代名老中医经典

新针灸学

XINZHENJIUXUE

朱瑾 著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当代名老中医经典

新针灸学

朱瑾 著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针灸学/朱璉著. —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80763-099-9

I. 新… II. 朱… III. 针灸学 IV. R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4687 号

新针灸学

作者:朱璉

出版: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南宁市东葛路 66 号 邮政编码 530022)

发行:广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广西民族印刷厂

(南宁市明秀西路 53 号 邮政编码 530001)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22

插页:9

字数:444 000

版次: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册

书号:ISBN 978-7-80763-099-9/R·33

定价:50.00 元

本书如有倒装缺页,请与承印厂调换



朱 璣

中國的針灸治病，已有五千年的歷史，他在使用方面，不僅簡便經濟且對一部分疾病確有效果，這就是科學，希望中西醫用結合改進，更進一步地提高其技術與科學原理。

吳作

贈朱璉同志

余久患三叉神經痛，劇發已
 去入今年又發時在廣州請
 市中副市長朱璉同志為余針
 灸二十餘日而病愈其間陶希
 晉同志常自南寧來電話詢問
 治療狀況陶朱夫婦深情妙技
 感必為詩紀之。

老頑生病亦稱頑，

千里深情電話傳。

頑病應當頑法治，

毛公耐字我知先。

金針控制第三支，

二叉功能有異歧。

唇吻翕張難自在，

齒齙舌顫失調司。

三叉神經皆服貼，

口腔面頰已如常。

埋針先後逾旬日，

艾灸相資亦異方。

一月將完病榻過，

幸同針灸共消磨。

累年痼疾從茲愈，

耄矣安聽國際歌。

董必武 一九六六年一月卅日

贈朱璉同志

余久患三叉神經痛，劇發已
 二次矣。入今年又發，時在廣
 州，請南寧市副市長朱璉同志為
 余針灸，二十餘日而病愈。其間
 陶希晉同志常自南寧來電話詢問
 治療狀況。陶朱夫婦深情妙技，
 均可感也，為詩紀之。

老頑生病亦稱頑，

千里深情電話傳。

頑病應當頑法治，

毛公耐字我知先。

金針控制第三支，

二叉功能有異歧。

唇吻翕張難自在，

齒齙舌顫失調司。

三叉神經皆服貼，

口腔面頰已如常。

埋針先後逾旬日，

艾灸相資亦異方。

一月將完病榻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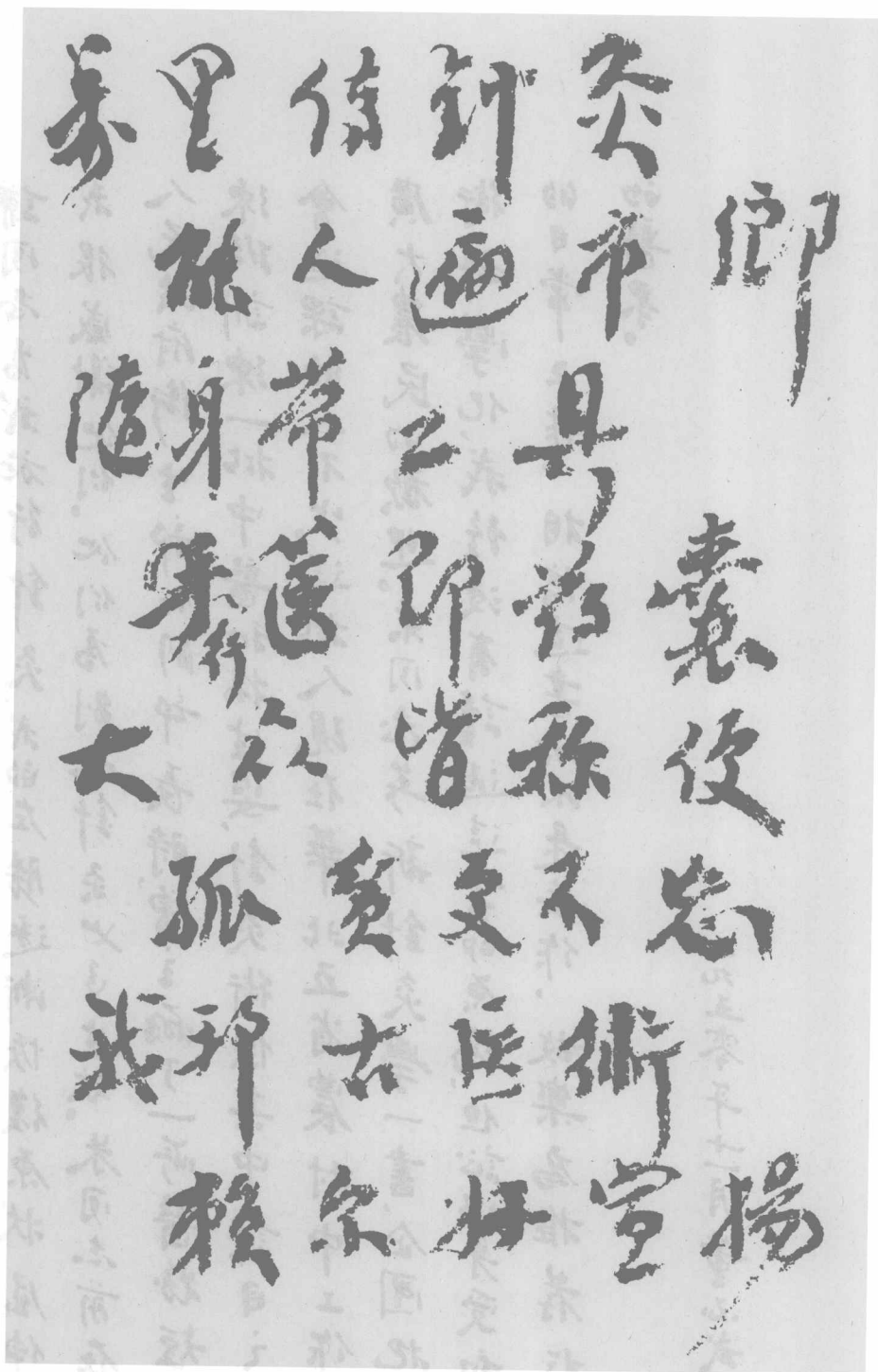
幸同針灸共消磨。

累年痼疾從茲愈，

耄矣安聽國際歌。

董必武

一九六六年一月卅日



又赠朱璉同志*

万里传针灸，能人遍市乡。
 随身带工具，行篋即药囊。
 大众皆称便，孤贫更不忘。
 我邦古医术，赖尔好宣扬。

* 董必武同志于一九六六年春又写了这首五言诗赠朱璉同志。

樣作。

我患過左膀酸痛病，舉動困難，有數年之久，曾試過一些治療的方法都無效。後來朱同志和他的學生許式謙同志為我施行針灸，我的左膀逐漸恢復原狀，屈伸自如。我很感謝他們，他們為別人針灸也多生效。朱同志前在華北人民政府衛生部任副部長時，曾主辦了一所醫務短期訓練班，訓練一批中醫和接生婆，針灸術係其中課目之一，學會這課的人不少。這批人現在華北五省農村中工作，頗受廣大農民的歡迎。朱同志著新針灸學一書，企圖把針灸術科學化，我雖沒有讀過這書的原稿，但証以身受和多年的日常工作，相信這書決不是妄作，故樂為推荐於我國的醫界。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董必武

序

針灸治病，在我國醫術上有很久的歷史。我國最古的醫書中就有這類的記載。從古到今，不拘城市或鄉村，都有人行使針灸術。他們治療某些病，不需藥品，往往有效。有時其效極速，人都驚異其神奇。術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又多故神其技，秘而不傳。西醫則認為這術不合科學，很少予以注意。所以針灸術直到現在，雖還在我國社會上流行，但始終沒有脫掉它神秘的外衣。我想，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我國的針灸術，剝掉它神秘的外衣，研究和解釋它合理的內容，加以發揚光大，在醫學和醫務上不是無益的事。特別是在我國醫藥而缺的今日，把工農勞動人民所習知的針灸術科學化發揚光大尤為必要。

朱健同志是學西醫的，他用科學方法研究針灸術多年，很有心得，想把這番心得寫成一書問世。我鼓勵她這

出版说明

中医指中国传统医学，它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我国一项民族文化遗产。中医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为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它很早就建立了学术体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都有不同的创造，涌现了许多名医，出现了许多重要学派和名著。

发掘、整理、继承当代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并加以深入研究、推广应用和发展创新是保持中医药特色，发挥中医药优势的前提和保障，是促进中医药文化传承及中医药学术健康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也是打造名医，培养高素质中医药人才的重要途径。

随着一大批全国著名中医泰斗、名医和中医临床“大家”逐渐进入耄耋之年，有效地抢救、继承名老中医经验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2004年在中医药工作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同志明确要求中医药行业实施以“名医、名科、名院”为核心的“三名工程”，并指出这是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增强中医药服务能力，扩大中医药影响的有效措施。

为挖掘和推广名老中医专家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弘扬祖国传统中医药学，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和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对广西当代名老中医的诊疗经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推出《当代名老中医经典》丛书，包括张汉符、张惠民、朱璉、陈伯勤等广西名老中医，以探索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使当代名老中医的证治精髓得到传承和推广，并推动中医理论和临床技术的不断提高。

《新针灸学》是我国现代著名针灸学家朱璉同志的临床遗作，书中系统地总结、整理了祖国传统针灸医学知识，是首部融入神经学理论来阐明针灸治病的科学原理的中医学著作，也是为数不多的得到朱德、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题词、作序的中医学著作，被称为我国现代针灸医学的经典。

本版由朱璉同志的弟子、全国第三批名老中医药专家韦立富同志在前几版的基础上，不辞辛苦地进行了校订和少量的充实整理，并对书中有关经络的彩图颜色按照目前国际通用标准进行了统一标示，完善了部分针灸治疗穴位的临床案例，是中医药院校师生及广大中医药爱好者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有极大参考价值。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序

——我与针灸

我不懂得医学，也不懂得针灸的科学道理何在，这里所说的我与针灸的关系，仅仅是针灸治好我的病的过程。

我的身体，除了很瘦以外，一般没有什么毛病。当然，遭受过反动派的种种迫害以及长期的游击战争生活，身体的各部分机能自不免有许多减弱，表现最严重的是神经衰弱、失眠和遗精。每在工作疲劳时就会发生，但一般还未影响工作。

1946年春，我奉命开展一项新的工作，因为人力和其他条件的困难，也由于自己不善于工作，在开始的两三个月中，经常处于疲惫状态，任何娱乐活动都没有精力去参加。越是疲倦，越想工作，后来发展到放下工作就吃饭，放下碗就又工作，甚至一边吃饭一边批阅稿件，晚上失眠时又起来工作，这样工作的效率当然不会高。但是，看见有工作就休息不下去，这不完全是由于工作的责任心所驱使，而主要是神经兴奋，不能自己。我和一些患神经衰弱的同志们谈过，他们都有这种经历。

在我的疲劳已经相当严重的时候，我们机关中一位负相当重要责任的同志，要求回家看看他阔别十余年的老父亲，我只好又兼管起他的工作来。在这样的十来天中，正当暑夏，天气很热，我当然更感觉疲劳了。但是，我总想等那位同志回来后代替我的工作，让我能完全离开工作休息一下，所以一直坚持到那位同志回来。在那位同志回来的当晚，我们谈得很好，我还吃了很多饭，可是我从那晚睡了以后，就再也不想吃饭，再也不想起来了。

起初，我每天还勉强能起来到门外走一走，后来就只有在上厕所时在院里转一转，以后甚至连床也不愿下了。患病的具体表现：一是不想吃喝；二是不能入眠，每天只似睡非睡地迷糊几个小时；三是每天下午微微发热，出汗很多，尤其是在夜里。当时曾请几位医生来看，都说神经太衰弱了，安眠药也不顶用，虽然吃了很多助消化的药，但是饮食还是很少，而且也很勉强。这样一直持续了10天，才派人去请朱琏同志来医治，希望她根据病情携带些速效药来医治。

朱琏同志来时，并没有带任何药。她细问了我的病情，把我的身体反复检查之后，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微笑着说：“给你扎针吧！”并叫我暂停服用其他药品。这自然使我很失望，因为我原来希望有一种特效药，注射一两针就会马上好的，但现在事已至此，我就只好由她去扎针了。

她规定我每天扎一次针，早晚检查两次体温，要我尽量想法吃东西，每隔三四个小时吃一次饭，并且用按摩来帮助肠胃蠕动。第二次她来扎针时，我自己感觉第一次针没起什么作用，但是她检查了我的身体以后说，已经好了一点，又继续扎了第二次针。到第三天，我已能睡两个钟头，吃饭也略多了些，但是还感觉不出有大的进步。她检查了

我的身体以后说，继续有好转。看她的表情似乎还有困难，因此她把前两天检查的记录反复看了几次，又把我扎针后的情况反复问了几次，决定在我脚上大趾与二趾之间，手上拇指与食指之间，很谨慎地下针，一边翻阅她的针灸书籍，给我的印象，这一天她用的心思很大。她第四天来时，我吃饭已不感觉勉强，并能熟睡6个小时，只是冷汗还很多，但大家都有信心了，她仍继续扎针。第五天扎针后，冷汗就很少了。她因为事情很忙，第七天决定要走。她说我体温已经正常，心脏的力量也已经加强，要求我只要想法多吃东西，决心一段时间不过问工作的事，慢慢就会好起来。因为我不相信这样就能治好，仍要求派人跟她去取有效的药回来，她笑笑同意了。但是我今天想来，那时所取来的药，恐怕仍是普通的药，事实上起作用的还是扎针。

因为能吃能睡，所以我在20天之后，已能散步200多米，脑筋也一天比一天清醒，能想一些工作的事情，由于工作的繁忙，不久我又回到了工作岗位。由于恢复工作太早，我的身体恢复得很慢，并且中间还犯过几次病，一般是在气候急剧变化和工作繁忙的时候。我在1946年冬天、1947年夏天和冬天、1948年夏天，都曾因疲劳、感冒发病，同时曾患肠炎，都是经过扎针后，很快就好了。从1949年8月起，因为不再从事夜间工作，一年以来，一直在好转，一般能坚持8小时工作，间或过度疲劳，只要主动地再扎针，休息一下就好了。

三四年来，我在与病为侣中，也可以说是与针灸为侣。因为我并未找其他医生看过，也没有服用过其他的药，只是感觉不舒服时，就找朱璉同志或她的助手许式谦同志扎一两次针就好了。有许多人笑我愚蠢，有很多同志善意地劝我不要再扎针。他们的理由概括起来不外几种：一是不顶事、不科学，他们认为许多贵重的药品都还治不了病，哪有这样便宜的事？而且说穴名、针法，都还是旧的一套，缺乏科学根据。二是说有副作用，民间有扎针伤气之传说，可能会成为一种习惯，像吸鸦片一样，扎就好，不扎就又差了，这样是越扎越差。然而根据我的经验，事实是顶事的，因为它治好了我的病，也曾看到许多人甚至是多年的老病都能治好，这是事实。至于科学的根据呢，我不懂得，就是朱璉同志也曾很谦虚地说，有些道理还有待于继续研究。但是我相信它是有道理的，譬如说治疗遗精，在下腹部扎针，有一次我向许式谦同志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在腹部扎下一寸多深是否会扎坏肠子，他说不会。第二，腹部与遗精有什么关系呢？但后来扎下去时，生殖器上就有发麻的感觉，这证明是有关系。而且经过扎针，遗精就停止了，这也证明是有道理的。至于副作用呢，三四年来我并未感觉到什么，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只要我自觉，而且环境又许可，生活与工作都有规律时，扎针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甚至可以不扎了，所以并没有形成什么习惯性。但是像我这样用针灸治好了病的是否由于偶然？究竟有什么科学根据？希望朱璉同志把我的情况、病状及扎针的经过，提供医学界研究，我想这对于研究针灸，对于医学，对于人们的健康，都会有很大好处的。

张磐石

1950年8月于首都

自序（一）

针灸医术确能治病，我在幼年时的印象就很深刻。因为它曾挽救过我祖母的性命，治好了哥哥的霍乱。但当时我因受封建落后思想的影响，总以为这是“下流人”剃头佬、擦背佬的行业，不值得我们去学习。以后学医行医十多年，又因忙于医疗工作，也从来没有想起过要去学习它。

1944年10月，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会议，毛主席在这个会上对文教工作明确指出了正确的道路。在医药卫生工作方面，毛主席号召学现代医学的医生要团结以中国古代医学为基础的医生，向他们学习并帮助他们提高，防治边区人畜的疾病。毛主席说：“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这以后，在边区政府召开的中西医生座谈会上，有一位六十多岁的任作田老先生，自愿把他三十多年针灸行医的经验提供出来，希望西医界深入研究针灸治病的道理。任老先生一讲完，我们在前方野战部队回延安的有些西医同志就发起签名，拜他为老师。我是其中的一个。

第二年的4月，我因病到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治，不几天，病好了，住院休养。有一天，院长鲁之俊同志笑嘻嘻地问我：“精神好起来了吧，明天我们开始在门诊室实验针灸，你高兴参加么？”这时我才知道他已经去过任老先生那边学习14天，学了学手法，抄了个手本，画了几张经穴图。当时我觉得机会很好，就欣然同意了。但对针灸的作用当时仍抱着怀疑的态度。然而实行针灸以后，事情越来越神奇，甚至使人目瞪口呆，无法解释了。

一位受过枪伤的团长，小便失禁，常常尿在床上或裤子里，有一条腿麻木不仁。开始针灸时，只是健腿有触电样的感觉。每天或隔一天针灸一次，每次针两侧同一个穴名的穴位，病腿逐渐地也有发麻发酸的感觉。有一次针背部的膏肓穴，下针不久，这位团长突然昏厥，牙关紧闭，四肢发冷，出冷汗，当时膏肓穴的针并没有起出，又在人中穴进了一针，他就立刻苏醒过来，觉得像睡了多时那样舒服。此后小便失禁的程度也减轻多了。我记得，他除针灸膏肓穴和人中穴以外，前后还针灸过骶骨部的上髎、次髎、中髎、下髎和腿上的委阳、阳陵泉、足三里等穴。

还有一位在该院工作的干部，患夜盲症，日子已经不浅了。一到阴天或黄昏的时候，或者在光线微弱的地方，不仅不能读书写字，连一棵一棵的大树都看不见。从扎针那天起，我用全副精神注意他视力的变化，每天清晨跑去问他头一天黄昏感觉如何？哪知第一次针睛明、瞳子髎，天黑时，他看得清大树了；第二次针攒竹、丝竹空，他晚上能看到报上的大标题字了；第三次针鱼腰、四白，他能看到报上笔划少的小字了；第四次针

上星、阳白，他能够在晚上看报了，只是眼睛觉得困乏些。以后又每隔一天重复针上述各穴，针了约十天，从此就完全好了。我每当听到他讲视力进展情况的时候，都禁不住咄咄称怪。因为在西医说来，夜盲症的原因是营养不良，缺乏维生素 A。因而这个病的针对性治疗，按西医书上说，首当注意营养，要吃牛奶、鸡蛋、肉类、鲜鱼、鱼肝油等维生素 A 含量丰富的食物。但他每天只吃两顿小米饭和瓜条菜，饮食并未改善，怎么针灸治疗就这样顶事呢？我和鲁院长研究，他也是惊奇不止。

治好了一个人，一传十，十传百，病人就越来越多了。过去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来治病的，农村群众并不多，他们害怕吃西药、打洋针、开肚子，非到万不得已不敢上门。这一会可就多啦，农民中有终年拉肚子的（习惯性腹泻），也有一个月只大便四五次的（习惯性便秘），还有其他许多病症，没有花一个钱，没有吃一点药，针灸就好了。有一个病人用门板抬来时，缩成一团，扶他起来，两只手还压住肚子，紧紧地皱住眉头叫痛。经诊断为胃神经痛，在他两小腿上的足三里穴，一边扎下一针，病人立刻眉眼开了，手也不压肚子了；又在脐上中脘穴扎下一针，病人更松了一口气，说：“神针！神针！一点不痛啦！”病人说着笑着，自己扛着门板回去了。

这年 8 月中旬，因为去听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两次报告，我在水深过膝的延河里来回四趟。这以后腰部到臀部觉得有些疼痛困乏，两腿沉重，脚跟也有些胀痛。起初还是少走些路就痛得轻些，五六天以后，不走路也痛得厉害了，从腰部、臀部、大腿后侧、小腿外侧及后面，放射到脚跟脚背，痛得如烧如灼、如钻如刺，不可忍耐，尤其是晚上痛得不能入睡。按这情况，无疑是因受凉而引起的坐骨神经痛。附近的医生来看我，也诊断为坐骨神经痛。于是，吃止痛药啦、注射止痛针啦、热敷啦、擦樟脑酒啦等，想尽各种办法，都只能一时稍减轻疼痛。我整整 3 个晚上没有入睡。这时才忽然想起了针灸，马上派人去和平医院向鲁院长借针，借回来时已是黄昏，剧烈的疼痛也正开始发作。没有人会给我扎，我就自己来扎，请别人照着灯看着表，告诉他入针 15 分钟后叫起针。针的是右侧臀部环跳穴，因自己给自己扎，右手动作方便。进针约 7 厘米，腿就感觉像触了电，从臀部一直贯通到小腿，脚背上也有感觉，我用拇指、食指在针柄上轻微地捻动了几下，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到了 15 分钟，我被叫醒起针，这时如烧如灼、如钻如刺的难受劲已烟消云散了。第二天怕疼痛再发，又针了左侧臀部环跳穴和两脚背内庭穴。这一次的治疗经验告诉我，在针刺后不一定要用艾灸。多蒙鲁院长来信说明送我两根针，从此我就有了这个工具。

这以后我遇到一针见效的病越多，我就越觉难以解释了。例如张化夷同志，多年来患夜间流口水的病，每天枕头上要湿一大块，针了一次合谷穴就好了。又如马溪山同志，他告诉我，半月前在雪天刮风的早晨出门，以后半边脸常觉发冷，含水漱口，水就由半边嘴唇冒出来。我仔细一看，他的嘴稍向右侧喎斜，当时诊断为颜面神经麻痹。他要我扎针，我说没有把握，可以试一试，就在嘴角两旁针地仓穴，又在右侧颊部针颊车穴，十多分钟，起了针，马同志再含水漱口，一滴水也不往外冒了。我再仔细看他的脸，别人也看，他自己也照镜子，嘴不喎斜了。嘿！屋子里的人都轰动了起来，有的用手指头敲桌子，有的在鼓掌，这个问什么道理，那个问什么道理，我心里也在问什么道理。在

这期间，我想找书参考，可是找不到。之后去请教会针灸的中医先生，他们又认为要懂针灸，必须熟悉“阴阳辨证”、“子午流注”、“九补六泻”等方法。同西医去谈论吧，得到的回答有两种：一种是认为值得研究，既能治病，就一定有科学道理，可是现在没时间去研究；另一种是“哼，有这个事情”？不发表任何意见。徘徊苦恼，最后自己给自己下了决心，不管它理论通不通，能治好病就干起来再说。于是就在我工作的一个医院和一个门诊部的医务人员中，把学习针灸作为一个工作任务，要大家学会针灸技术。

1946年到现在的三年中，我在针灸工作上虽然还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可是同志们对我的希望和要求却非常迫切。又承同志们给我搜集了一些关于针灸术的医学书籍，使我在研究中有了参考资料。

到现在为止，我在针灸研究中得出这样几点体会：第一，中国古代针灸的穴位虽然分属手三阴、足三阴、手三阳、足三阳和胸前背后的任脉、督脉的十四经，但其所在部位，大都是合乎科学的人体神经系统的解剖情况的。至于经脉的起止行度则还待进一步的研究证实。有的医学家主张的孔穴，虽然有许多是常用的穴位，但完全否定十四经经穴，又未免太迁就肌肉与骨骼的一般解剖，而且与神经分布也有出入。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研究穴位的解剖及其生理作用。第二，中国针灸疗法，一般是针后再灸。在人体700多个穴位中，仅少许能针不能灸或能灸不能针。有人还把它分成针刺治“内症”，艾灸治“外症”。日本热心于针灸研究的医学者，把针灸分为针科学与灸科学，认为两者各有治内外各症的效用。可是在我们的经验里，有的病可以针与灸同时并用，有的病单独针刺即可，有的病单独艾灸即有效，甚至有的病以针灸与药物配合治疗，才能达到治愈的目的。有的禁针、禁灸的孔穴，根据解剖部位，同样能针能灸。如果我们能求出它的治疗原理，将会使针灸医学得到更广泛的运用。第三，针灸疗法所以能治胃肠神经痛、急性或慢性胃肠炎、习惯性便秘、习惯性腹泻，以及其他慢性病和神经衰弱等症，是因它确有调节神经系统功能的作用，它能调整红血球、白血球的数量，它能加强人体的抵抗力。在治病中我曾用化验室的检验，证明了针灸对红血球、白血球的调整作用。其他如针灸在帮助诊断上也有很大的作用。但有些针灸医生以针灸治病为万能，这是不对的。据我的经验，有些病能针到病除，有些病可减轻症状，但也有针灸无效的。这些问题，此处不作详谈，以待专篇论及。针灸医学是中国几千年来宝贵的文化遗产，为了从科学上加以提高并改进其技术，希望有更多的中西医同仁来参与这个研究。

（原载于1949年3月14日《人民日报》，题为“我与针灸术”）

自序（二）

前几年，我们在华北老解放区的农村中，曾用针灸术治好了许多病，节省了不少药品，而且它的预防作用也颇大，群众非常欢迎，使我们感到它有进一步研究与推广的价值。同时，我们又看到有些针灸医生施用针灸，很少注意消毒，他们不熟悉生理解剖，虽有些经验，但有时引起感染化脓和其他恶果，因此又感到帮助他们改进提高，确是一件重要的事。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最初动机。

1948年冬，前华北人民政府批准我办一个实验性质的学校——华北卫生学校，内分四个短期训练班：医生班、妇婴卫生班、助产班及针灸班。学员大都是已工作三年以上的医务人员，中西医都有。训练的内容和目的，除了业务上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以外，还要求学员要树立献身于农村卫生事业的思想。要求了解党的政策，打破脱离政治的倾向，认识预防第一，认识卫生工作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认识卫生工作的群众路线，并学会推动群众性的卫生运动。各班都设有针灸课。针灸班则除主课针灸之外，还教生理卫生、细菌、解剖、病理、诊断等课，以及预防接种等技术操作。针灸课由我任教，教材是临时编写的提纲，现讲现记录。

当时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很快就把中医以为西医只懂外科，西医认为中医没有什么作用，以及互相轻视的思想打破了。中西医学员之间互相交流了经验，并且充实了讲义的内容。同学们在毕业前，都被派到平山县各区村实习。在实习中，他们受到群众的欢迎，从事劳动人民卫生工作的热情也更高了。原为西医的同学，在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祖国针灸医术的效用；原为中医的同学，听到群众说：“新针灸，讲干净，不觉痛，又见效。”新针灸特别受到欢迎，也就深刻体会到旧针灸术有改进的必要。特别重要的是从这次实习中，大家体验到，针灸是开辟农村卫生工作的一个简便易行的武器。因为学习针灸不太困难，治病的效果颇大，并且没有发生任何危险，在解决农村迫切的医药问题上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这是一。其次，经验证明针灸是群众熟悉的，最不费钱，为广大群众所欢迎。我们通过针灸的治疗，很快取得群众的信任，就可顺利地进一步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再次，农村里的中医，见到我们懂得这门技术，也就乐于和我们接近，并相互学习，这就使农村里的中西医的统一战线工作也能顺利地展开。

在实习中，同学们都纷纷反映需要这方面的书籍，这是我早就料到的。在举办卫生学校时，我同时组织了一个编辑组，帮助我整理讲义，组长是彭庆昭，组员有教务主任兼诊断学教员张殿华、解剖学教员甄石度、病理学教员燕图南、卫生学教员李解、生理学教员王雪苔以及卫生学校门诊部负责针灸的医助杨喆等同志，另外还有卫生学校针灸班学员代表张滢廉、赵焕文两位老针灸医生。我们每天在一起研究讨论、整理临床资料、参阅古籍和重新审定穴位。如此紧张地工作了几个月，才使我把原来训练班的讲义，能

于去年夏天写成了这本书的初稿。这里，我应向这个组的同志们致谢。

初稿完成后，我们由平山县卫生实验区来到新解放的北京。当时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主席曾督促我将此书出版。可是那时我思想上还有一些顾虑，一则是觉得过去在农村中研究尚不很成熟，二则是入城后遇着不少学西医的同志对针灸研究不表赞同，加上入城后，行政工作繁忙，这本稿子就被搁了下来。后来，卫生学校毕业的同学从华北各地纷纷来信，报告针灸在工作中如何起作用，并一致催促将此书出版，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愿意研究针灸的人，传闻我在研究针灸，就不断来信索寄书籍，在京有些同志也不断催促，这样我才下决心将此书出版。我觉得针灸既然在实践中证明有它的作用，且对它的科学原理又有了初步的理解，那么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促使它向现代科学化的方向前进，为了及时提出这一问题，供我们医学界同仁共同研究，以便将已得的经验，再拿到实际工作中去考验，此书的出版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就挤出时间将原稿从头审阅修改后，拿去出版了。这几年来的临床实例则没有完全编写进去。我希望这本书出版后，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指教，使此书中存在的缺点甚至错误能够很快地得到纠正。

1950年5月3日于北京